

沧桑文丛

主 编 ■ 李 辉

留下世纪的
影子和声音
提供真实的
纪录和思考

邵燕祥·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人生败笔

——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



沧 桑 文 丛

人 生 败 笔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

邵燕祥 著 责任编辑 张志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288 千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215-04107-7/K·605 定价:19.50 元

“沧桑文丛”总序

每个人都生活于沧桑之中。

沧桑是时间的流动。昨天、今天、明天，在流动中构成一个整体。如同一条河流的水，尽管来自不同山川，一旦流在一起，便浑然一体，无法将之一一分开。

沧桑也是空间的存在。同一个时刻，同样的阳光照耀下，或者同一场风雨之中，每个人都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便使流动着的沧桑变得丰富起来。

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在他的心灵世界里，沧桑便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他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着历史，他在空间的存在中感受着世界，或者说，两者从来就是一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群体、抽象与具体的交叉渗透中，沧桑才赋予人的情感、思想、人生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2138/24

大概还没有别的时候,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门坎时更让人感到“沧桑”这个词的含义。似乎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社会的变迁。不管他处在什么历史位置,不管他的过去是如何走过,回首往事,抚摸流逝的日子,都将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对更多的读者来说,处在世纪转折时刻,历史的好奇心也将愈加强烈。他们知道,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和昔日的历史场景,实际上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是如何走过,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人们是如何出演着生活的戏剧,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把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深深吸引。

主编一套“沧桑文丛”的构想,便在这样一种感受中形成。

“沧桑文丛”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地位、职业的限制,题材不受其大小重轻的限制,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

不猎奇,不虚饰,历史的真实应该是“沧桑文丛”的灵魂与品格。

重要的当然在于,文丛中的作品,能够留下这个世纪的影子和声音,能够为下个世纪的人们,提供真实的历史记录。我相信,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才会受到读者

的青睐,才是“沧桑文丛”这种类型的丛书的生命力之所在。

愿这样一套丛书,以它独有的姿态,伴随着读者走进新的世纪。

李 辉

1997年1月28日

为什么编这本书？

——《人生败笔》序

30年过去，真的是时过境迁了。这本书里涉及的人事，来自历史的，都应返还历史了。

编这本书，既不是再为个人晓晓不休地辨诬，更无须纠缠于一个单位运动中各阶段各个组织和个人的是非功过了。

如果只是辨诬，那么在“定案材料”后面附上一份申辩材料，如本书卷首的两篇就已解决问题，足够了。但事实上，当事人彼时仅仅为了辨诬，写一份申辩材料是脱不了身而只能“引火烧身”的，后来围绕着“定案”和“翻案”，又衍生出多少口诛笔伐。在这些文字官司背后，有过多少各式各样的激情啊！

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

在我，这是可耻的十年。

也许可以说，直到今天面对这可耻的记录，我才真的触及了灵魂。

从1959年到1966年间,我是力求“紧跟”,以示曾为“右派”者改造的决心已经付诸行动;凡是1957、1958两年里批判我时提到过的,那些触犯时讳的思想和文字,都不复见于我的笔下。

唯其“紧跟”,到了最需紧跟的时刻,在我也渴望投入的革命狂潮中,我当然不会怀疑,更不会抵制各项“最新最高指示”的新提法,如“中国的赫鲁晓夫”乃至“刘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等等。

我读过一些人的讣告、生平和回忆录,他们都在那不平常的年代里对“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的斗争,使我十分惭愧。当林彪、江青们在台上的时候,我想都没想过要反对他们,而是像征引《毛主席语录》那样,把“林副主席”“江青同志”的话奉为圭臬;形诸言语文字,还很有一点奴颜媚骨呢。

收入这本书时,于此等处,一仍其旧,不作改动,以彰史贵存真之信。

什么是历史?

社会地位不同,经济利益不同,意志和愿望各不相同的人群,那不同方向的合力构成平行四边形,充塞了空间和时间;这就是历史。

世界有世界的历史,国家有国家的历史,民族有民族的历史,几十个人、几个人的社会群体也各有自己的历史;一个生活在历史中的人,自然便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这一堆当代的化石,记录着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状态和心

理状态,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

你在这里看到,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冲击下,为了恢复已丧失的尊严,竟不惜彻底地牺牲尊严。

机会主义的生存策略,总是要造成病态人格,这并非上述特定时期所独有,只是在那十年中间更多,更常见,症状也更加严重突出。

在政治斗争中,妥协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就是妥协。书生的迂气和傲气,本来是不知妥协为何物的,然而投之于实际政治,历来就是教你放下架子、或者叫做打掉架子,去掉迂气和傲气、或者叫做改造思想作风,于是不得不妥协。但政治家的妥协是以不蚀本为限度,即使小有蚀本,也要不伤元气,徐图再起;读书人的妥协,则是缴械投降,一蚀到底了。

在平时,这一切是以思想改造的方式进行的;到了日常的政治工作激化为政治运动的非常时期,无处没有阶级斗争,无处没有敌情,“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若非“革命的动力”,即成“革命的对象”,对于一般所谓知识分子说来,要“革命”,即名列于革命的序列,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求生这一层次上的问题了。

于是乃有“革命”众生相。

那一次号称史无前例的革命,虽以文化为题,文章却是做得“大”出文化人的圈子,不愧为“大革命”。

事过回首,人们先是看到了政治上的后果,便“拨乱反正”,看

到了经济上的后果,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看到了文化上的后果,便“建设精神文明”:以为这就疗治了创伤,慢慢地也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了。

把裹挟了上亿人众的一场龙卷风,说成是一场闹剧,当然肤浅,当然偏激。

说成是连演了十年的民族悲剧,就是深刻的、严肃的见解了么?

在悲剧中,玉碎的壮烈,使人震颤于崇高。

确有这样的人和事,但不仅仅是这样的人和事。

使人,至少使清夜扪心自问者感到羞耻的,有外来的屈辱,也有的是自取其辱。

这配称作悲剧么?

1979年,我说我从此不写检讨,从此不作“自我批评”了。

我说我写的检讨,字数远超过我写的文学作品,盈筐充篋,几平“等身”了。

我说我的经历告诉我,号召自我批评已经沦为指供和诱供,因为有人是专司批评别人的,有人就只得专作自我批评,也就是整人与挨整之别了。

整人与挨整,平时亦有之;一到运动来时,对错误和缺点的自我批评即检讨,升级为“认罪”和“谢罪”,而操批评权以至批判权者,自然相应升级为对“犯罪者”的声讨。

声讨者拿帽子找头;检讨者拿头找帽子。声讨与检讨,都是帽子越大越好。一反不如两反,两反不如三反。要么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要么是反党反人民反革命。声讨者的帽子大,“上纲”高,才过瘾,才显得革命立场坚定,水平高;检讨者的帽子大,“上纲”高,才显得有认识,态度好,好过关。

声讨别人的也难免要做检讨,常做检讨的有时也声讨别人,自动或被迫揭发别人。不言而喻,都要竞相“上纲”。

在那年月,最高的境界是“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因此最大的罪恶就是反对毛主席了。大字报和批斗会,“打蛇打七寸”,竭力要让被批斗者承认的,就是“反对毛主席”;被批斗者知道要害所在,坚守的最后防线,也就是“从未反对毛主席”。批斗者进行有罪推定,证据不足则借助于“实际上”;被批斗者不得不“顺竿爬”以求解脱时,便也只承认到“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为止。有了这个“实际上”作为过渡和缓冲,虽会带来关于动机与效果的无穷争论,但毕竟对被批斗者是网开一面,批斗者也得以“下台阶”;倘不存在一个止于推论为“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中间地带,干脆不折不扣地“真正反对毛主席”,那就非抓起来判刑不可,否则必定成了右倾包庇,立场问题。

自我批评变成“认罪”,“谢罪”,要把人们平时已被养成的负罪感、原罪感推到极致。

这既有苏联从对“反对派”斗争发展到莫斯科审判的轨迹,又有从中国皇朝至民国年间的臣宰、太监、阿Q们口称“奴才该死”,自打耳光的馀绪。

一方面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进行诛讨,一方面是口口声声“臣罪当

诛兮，天王圣明”，配合得多么投契啊。

冷静地面对这一页历史，我发现自己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在毛泽东身上寄托了由衷的、发自天真的尊崇和信赖，甚至可以说不仅是崇拜，且达到了迷信的地步。倒是有些以捍卫毛泽东为名对我进行批判和斗争的朋友，好像早就不再有这种心态了。

比如问我《强项令》中的汉武帝是影射谁，《诽谤者和毒蛇》中的魔王是影射谁，“导向”分明，我可是想都没往那儿想过，真是匪夷所思！

对于当时曾经对我执行批判的群众和干部，付印时使用代号，或改易姓名。曾被我在申辩材料和大字报里“反击”过的干部中，两位已去世有年，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安息。走笔至此，忽然对包括他们也包括我在内的人们，生出一片悲悯之心：大家当时之枉抛心力，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

人们历来对一切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事情，如地震，没有喊冤的，可说是听天由命。但对人祸，虽不能却之于既往，但应求避免于将来。即使其中或亦有许多变数，有历史遗留等诸多因素使然，不能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还应该采取“尽人事”而后“听天命”的相对积极的态度吧？

你也许奇怪：一个人写点东西，做点工作，就至于弄成这么“大”的“问题”，招来这么多的麻烦吗？

过来人重温这些，自然别是一番滋味。

今天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不知那个“遥远的年代”人们的

行为逻辑和语言方式,那么答案全在这里了。

那时候,在所有公众场合,人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模式的人际关系中,以这样的模式讲话和行文;稍有出格,即属惊世骇俗之举,会招来杀身之祸。

当时这样做,人皆视为“正常”而通行,或因通行故以为“正常”;对这样做表现出稍不适应,就有“格格不入”之嫌,背离了规范就成为“非常”的特立独行,家人担忧,路人侧目了。

一个观点,一句话,或一张大字报一封信一页日记,都可能变成影响一个人荣辱安危的大事,甚至招致家破人亡!

书里保留的这些文字材料,可以视为当时的流行文体——检讨交代、大批判、大字报等的一份标本。

这里从一个案牍小吏、文字工作者、又是“摘帽右派”的角度,反映了这样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中一部分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挣扎,提供了正史所不可能提供的细节。

所谓检讨交代,即“自我批评”或“自我批判”,其实就是第一人称的“大批判”。分寸容有不同,口径并无两样。

大批判,说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而它最突出的特点恰恰是不顾事实,蛮不讲理。

什么都是最最最,一切趋于极端。“攻击”必是“恶毒”,“反党”必是“猖狂”,形容词须用最高级,上纲与定罪务求置之死地。

因此,必然从否定对立面发展到否定一切。毛泽东说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于是遍地查获“反对毛主席”的人犯;好像如果不报告说发现各地各部门都有人“反对毛主席”,就对不住他老人家似的。

而所有这些“反对毛主席”的人,全都必须顺理成章地“上挂”于一个“刘邓黑司令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尽入彀中,几无噍类矣。加上“上面有什么,下面也有什么”,就像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全国要打出无数“反革命小集团”;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地也都打出若干小“章罗联盟”等,已成为一个公式:于是在这里,一个小小的县团级文艺单位,也有某某人要“搞推翻政委的反革命政变”,以及“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之说了。

至于自愿或被迫或“被迫自愿”检讨的人,会像本书中某份“思想汇报”那样,推导出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是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张目的政治结论来,也一点都不奇怪。这跟所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大批判一样,是在设定类似的大前提下所作的逻辑推理。而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还一度学“革命小将”的口吻,指别人为“混蛋逻辑”!

统观全书,年轻人或许会以轻蔑的眼光,看做一场“几乎无事的悲剧”以至彻底无聊的闹剧。然而当时的人们,至少那些不得不卷入的人,生命就这样像煞有介事地,或无可奈何地白白浪费了。

不过,有时我聊以自慰地想,即使没有这场运动,有些人,例如我的生命,也未必不以另外的方式消耗掉。——如本书所显示的,邵某写了那么多篇幅,引了那么多语录,作了无数近于乞怜的表白,都是围绕着一己的沉浮,最终不过是要求“组织处理”勿为己甚罢了。——以我当时的状态,能够做出什么于历史、于人类真正有益的事情呢?

邵燕祥

1996年11月23日

[附白]编这本书,不是作为个人的履历参考,而是提供若干有助于历史思索的实证资料。因资料围绕我这个具体的人,有必要把我在那一段时期的主要经历列在下面,以便陌生的读者对背景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在1959年9月,由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摘掉右派帽子,从黄骅农场调回广播局,先后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广播文工团工作,1966年6月时为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手边有一纸1978年写的“文化大革命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具体情况”,照抄如下:

“1966年6月停止工作,8月下旬至12月下旬作为所谓‘梅益黑帮’送入广播局文革小组所办的‘政训队’‘隔离’四个月。在此前后由广播电视剧团文革小组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作出开除公职监督劳动的处分决定,强迫画押,并进行大会批斗多次。

“1967年2月由(剧团)群众组织宣布上述处分决定无效。由此成为本单位两派争议对象之一。

“1967年底、1968年初向进驻广播局军管小组写信,申诉我从1949年以来创作主流是革命的。军管小组指令群众组织‘广联总’批判我的‘右倾翻案’,于1968年5月送入新办的专政队,直至1969年4月专政队解散;接着作为清(理阶级)队(伍)审查对象送往农场劳动,1970年转河南干校,至1973年12月离校(长期间内

只劳动,不参加政治活动^①)。

“1973年12月至1974年7月奉命在家待分配。1974年7月指定在广播电视剧团舞台队干木工、装卸等体力劳动,至1977年4月。

“1977年4月调回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恢复工作。

“至今未正式平反。有关材料也迄未同本人见面并按规定进行处理。”

1979年1月,广播局决定改正关于划我为右派分子的结论。

① 严格说来这句话有语病。因为不允许参加的只是某些活动;而让我做检查、受批判,这也是政治活动,或者叫做“被活动”吧。——邵注,1996年。



目 录

为什么编这本书？

——《人生败笔》序 /001

邵燕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1966年9月22日) /001

我对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前文革所编《邵燕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的意见(1967年4月) /013

一九六六年

思想检查报告(1966年4月2日在剧团编导组会上谈) /057

关于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的补充检查(1966年4月14日对奚振伟、××同志谈) /072

我的交代(1966年7月22日) /083

批斗会的简要记录(1966年8月) /101

诗词十八首(1966年6月—12月) /117

一九六七年

告奚振伟(1967年2月21日) /129

给奚振伟的一封信(1967年5月31日) /135

关于为陈庚所写旁证材料的一个声明(1967年8月20日) /140